

### 创作者谈

我出生在“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为东北电影制片厂)。从小,我就有机会观赏各类影片。摄影棚和道具车间里的各种飞机大炮,让我们这群男孩儿流连忘返。我们最爱抗战题材的电影,每当有抗战电影放映,我和小伙伴们都会早早跑到电影院,抢占最好的位置,兴奋地注视着银幕上的英雄们怎样运筹帷幄、痛击侵略者。在厂里一遇见饰演英雄的叔叔阿姨,我们就追上前,问台前幕后的故事。他们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拍摄、讲历史、讲中国人的抗战精神。光影流转,在长辈们的娓娓道来中,一群半大孩子默默做着英雄梦。

从上世纪40年代末起,长影推出许多优秀的国产抗战电影,像《中华儿女》《平原游击队》《赵一曼》《两个小八路》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这些电影影响了一代代中国观众,也伴着我和同龄人长大,片中的许多台词都成了我们儿时的游戏“剧本”。那时,总会有一个“不幸”抽中敌人角色的小伙伴不甘心地嘟囔:“高,实在是高。”然后另一个扮演英雄的孩子就会高声说出那个经典台词:“不许动,举起手来!我是李向阳!”



在我成长过程中,除了国产抗战电影以外,反法西斯题材的译制电影同样脍炙人口。比如诞生于1966年的法国影片《虎口脱险》,讲述1942年英国空军一架轰炸机在巴黎上空被击中,机上乘员在巴黎市民的帮助下突破纳粹围追堵截,成功逃出法国的事迹。影片惊险紧张让我们捏一把汗,诙谐幽默又让大家捧腹大笑,直呼过瘾。

高中毕业后,我考入中央戏剧学院,之后进入国家话剧院,成为一名演员。20余年的演艺生涯中,我塑造过许多角色,也实现了自己的英雄梦。然而,最让我无法忘记的并不是扮演英雄,而是一部讲述抗战时期普通中国人遭遇的电影——上映于2009年的《南京!南京!》。和儿时观看抗战影片时受到的鼓舞不同,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极为痛苦,因为它触及的是中国人心头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因为它发生在1937年的南京。

《南京!南京!》由陆川执导,以南京大屠杀惨案为主题。我在片中饰演一名普通的中国人。参与影片的每个工作人员都深知这段历史的沉重,从服装、化妆、道具到布景,每一个细节都极力贴近真实。也正是这种真实感,把我一步步推进了历史的真实:侵略者的残暴面容、带血的刺刀、人群绝望的呼号、孩子撕心裂肺的啼哭……这些场景,一次次将我拖回30多万同胞坠入的深渊。哪怕摄影机停转,我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痛苦、屈辱、愤怒、绝望……拍摄过程中的记忆是沉重的,我甚至数次想退出拍摄。不只是一,剧组中许多演员都因那段经历严重失眠,久久无法平复心情。

《南京!南京!》由陆川执导,以南京大屠杀惨案为主题。我在片中饰演一名普通的中国人。参与影片的每个工作人员都深知这段历史的沉重,从服装、化妆、道具到布景,每一个细节都极力贴近真实。也正是这种真实感,把我一步步推进了历史的真实:侵略者的残暴面容、带血的刺刀、人群绝望的呼号、孩子撕心裂肺的啼哭……这些场景,一次次将我拖回30多万同胞坠入的深渊。哪怕摄影机停转,我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痛苦、屈辱、愤怒、绝望……拍摄过程中的记忆是沉重的,我甚至数次想退出拍摄。不只是一,剧组中许多演员都因那段经历严重失眠,久久无法平复心情。

哪怕我们力图最大程度还原那段历史,最大的感受仍是:“很难想象!”——很难想象1937年那个冬天,南京城沦为怎样的人间炼狱。而这一切,距离我们不足百年。当年的幸存者如今也纷纷年届九十,他们或许已经无力诉说自己已经受的残暴罪行,但记忆还在。他们是否仍被梦魇折磨?是否还会时常恐惧?

拍摄电影,记录史实,就是要提醒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我们和那些大屠杀的幸存者是在同一

个时代的人。也是为了提醒人们,恶魔从未真正远去,它潜伏在人性的阴影里,潜藏在偏见、狂热与麻木之中,等待被遗忘、被忽视、被纵容的时刻。

《南京!南京!》上映后,在多个国际影展中获得荣誉。2023年,聚焦娱乐影视行业、拥有百年历史的美国刊物《综艺》(Variety)评选全球影史30部最佳战争电影,《南京!南京!》名列其中。这部电影能够引发广泛回响,正是因为各国人民对这段历史有着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共鸣。记得2011年,我和美国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一同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文化艺术论坛”。2005年,我们曾在电影拍摄中有过合作。重逢时,我将《南京!南京!》的光盘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郑重地赠予她作为纪念。斯特里普感动地说,她愿意更多地了解中国,包括中国的历史。

也正是因为共通的记忆和情感,拍摄反法西斯题材电影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持续的表达。从1940年至1945年,约有300部反法西斯题材电影问世。迄今为止,全世界电影人共拍摄1300多部反法西斯题材电影,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据互联网电影资料库(IMDb)统计,标注“反法西斯”标签的电影、电视剧和短片已超过4900部。也正因为拍摄另一部中国抗战题材电影,我有幸和年轻时的偶像、美国演员布鲁斯·威利斯合作。我问是什么让他不远万里来中国拍这部电影?他的回答让我感动:这个题材属于全世界,每个人都应该参与,不论身处何地。

为了解更多中国以外的反法西斯故事,我游历欧洲,去探访一些还在的人和事。边境线上那些冷冰冰的碉堡、工事,仿佛都在提醒我们:那段历史并不遥远。后来,我陆续观看了《斯大林格勒》《桂河大桥》《美丽人生》等欧美反法西斯题材影片,它们的故事内容和表现方式各有不同,但核心表达是一致的——记录、反思这场给人类带来浩劫的灾难。

2017年,我和太太安娜专程前往法国巴黎,拜访玛瑟林·伊文思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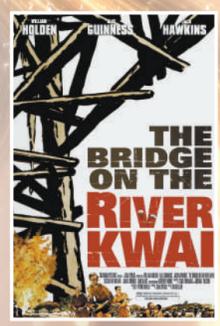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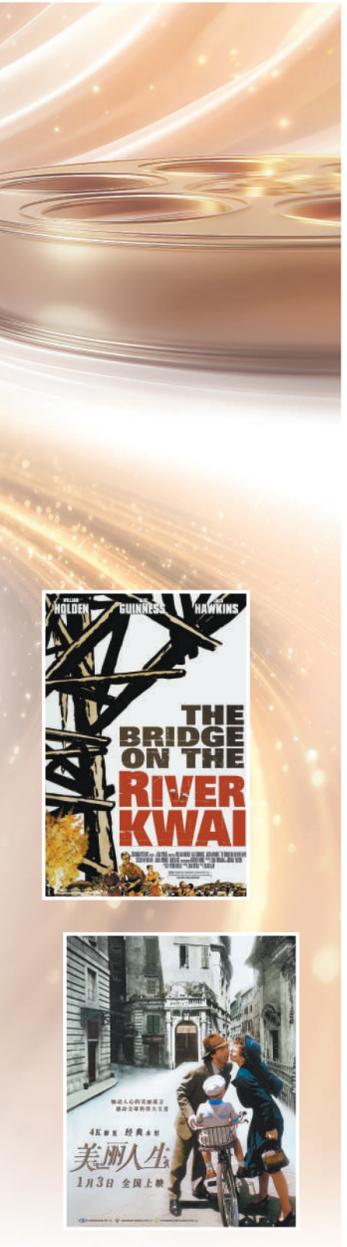
# 中外光影之中 历史记忆永存

刘 焯



士,她是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的遗孀。1938年,正值中国抗战的艰难时期,伊文思先生来到中国,用镜头记录下台儿庄战役等无比珍贵的军民抗战史料。这些影像也成为那个时期世界了解中国抗战的窗口。

玛瑟林女士的家中摆放着中国瓷器,墙上挂着刺绣和画家黄永玉专为她创作的中国龙画作。老人家很高兴看到我这个远道而来的中国年轻人,为我们讲了许多她与伊文思先生在中国的往事,讲了许多他们和中国人



友谊。看得出,她很珍视当年在中国结下的情谊。当我对伊文思先生在中国拍摄抗战影像资料表达尊敬和感谢时,老人家只是微笑着拉起我和安娜的手,温暖地说:“要记录,要记忆。也要爱,要互相爱。”

2018年,玛瑟林女士去世了。今年7月2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幸存者照片墙上,又熄灭了两盏灯。历史的亲历者们正逐渐远去,但记忆不能忘。我们要做的就是去记录,去记忆,也要像玛瑟林女士说的那样,要爱,要互相爱。

图片从上至下依次为:电影《平原游击队》《赵一曼》《虎口脱险》《桂河大桥》《美丽人生》《南京!南京!》海报。 资料图片

刘焯,演员、中国电影协会会员。1998年以电影《那人那山那狗》出道,此后主演电影《南京!南京!》《建军大业》《望道》、电视剧《北平无战事》等,塑造了多角色的荧幕形象,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等奖项,作品在戛纳、威尼斯、东京等国际电影节亮相。2013年,法国文化部授予刘焯“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

## 为人民而歌

李安琪

“我的星,我的月,我春日的枝头……”时至今日,行走在希腊的大街小巷,在咖啡店、小酒馆以及人们轻吟的曲调中,你仍能寻找到20世纪希腊音乐家米基斯·提奥多拉斯的痕迹。他的旋律深植于日常生活,影响着几代艺术家。如今,这些旋律跨越国界,承载着希腊人民的声音,来到遥远的中国。

7月30日晚,“抒情的米基斯·提奥多拉斯”百年诞辰纪念演出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音乐厅举行。演出当日,座无虚席,电吉他、贝斯等现代乐器与希腊传统乐器布祖基琴同台演奏。《如今花朵凋零》《我问那小北风》《谁在迫猎我的生命,谁?》……提奥多拉斯的两位学生塔尼娅·察纳克利杜、玛丽亚·帕帕乔治乌为听众深情演绎多首经典歌曲。演出结尾,在布祖基琴的伴奏下,两位歌手亦足跳起希腊传统舞蹈,将人们的思绪带到那个群岛与海洋的国度,那个诗歌不为点

缀生活而为构筑生命的地方——希腊。

对大多数中国听众来说,提奥多拉斯的名字并不熟悉,但他为电影《希腊人佐巴》创作的主题曲是许多人记忆中的旋律。这是一首希腊希塔基民谣,曲调听起来像向句,声调逐渐上扬,随着旋律的反复,听众不禁想要张开双臂一起舞动。这首曲子是提奥多拉斯在1964年的一次深夜即兴演奏中创作的,在影片中初次响起的时候,智慧的希腊老农民正年轻的英国作家讲述如何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桑图里琴。

提奥多拉斯生于1925年,这位杰出的希腊作曲家、指挥家一生经历战乱、囚禁与流放,颠沛流离的生活成为艺术创作的土壤。17岁那年,提奥多拉斯加入希腊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希腊民族解放阵线。20世纪50年代,提奥多拉斯前往法国巴黎进修。当时的巴黎音乐以

高度现代主义、前卫美学为特征,身处其中,提奥多拉斯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自己音乐的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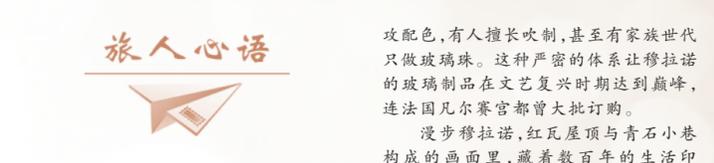
1960年,提奥多拉斯因为“无法严格遵循西方盛行的任何审美趋势”而回到动荡中的希腊,并发表《希腊音乐重组计划草案》,呼吁开展音乐教育改革,创建独立的交响乐团,加大对希腊本土音乐的研究。

回国后,提奥多拉斯不断思考如何让音乐真正贴近希腊大众,探索一条连接希腊音乐传统与现代西方音乐的路径。他的创作转向民间音乐与流行音乐,从乔治·塞菲里斯、扬尼斯·里索斯等希腊诗人的作品中汲取灵感,并将西方传统交响乐与希腊蓝调里贝提克、岛屿民歌等相融合,创作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歌曲。直至今日,人们仍可在当代希腊歌手的作品中看到提奥多拉斯的影子。

提奥多拉斯的艺术创作植根于深厚的爱国情怀,斗争中的人民的感

## 穆拉诺的火与光

贾学义



意大利威尼斯泻湖的晨雾总带着三分诗意。淡青色的水汽漫过纵横交错的水网,将百余座小岛晕染成画中淡影。木柴划破镜面般的水面,惊起几只白鹭,翅尖扫过的涟漪平静后,能瞥见水底摇曳的海草与碎瓷片——那是几个世纪前往来商船遗落的痕迹。在这片被亚得里亚海温柔环抱的水域之中,穆拉诺岛如一块被时光打磨的玻璃,静静浮在水上,等待晨光揭开它的面纱。

晨雾尚未散尽,78岁的安东尼奥·巴拉诺已在一根烧得通红的玻璃管架上忙碌。他布满老茧的双手如舞者般灵活地转动着吹管,管尾的熔融玻璃在晨光中泛着琥珀色的光晕,逐渐膨胀成一只花瓶的雏形。在穆拉诺这间老作坊里,火焰已燃烧了5个世纪。

作为欧洲玻璃工艺的圣地,穆拉诺的名字与“千花工艺”“金星玻璃”等绝技紧密相连。13世纪末,威尼斯共和国为防止火灾和技术外传,将所有玻璃匠人迁至这里。如今,岛上仍有多家作坊延续传统技艺,巴拉诺家族的“火焰之花”就是其中之一。

作坊陈列室像一条凝固的彩虹。入口处的千花瓶最为夺目:匠人先将数十根红、蓝、绿三色玻璃棒烧熔成线,趁热拉伸成纤细的玻璃丝,然后将它们重新熔融、吹制成型,瓶身浮现出如万花筒般层层叠叠的星状花纹,阳光穿过,在地面投下流动的光斑。角落里的金星玻璃摆件则藏着另一种神奇:在熔融玻璃中加入铜或银的结晶颗粒,经特定温度慢烧后,表面浮现无数闪烁的星点。其中一只仿文艺复兴时期的圆盘,金色星芒在深紫底色上流转,仿佛把夜空锁进了玻璃。

精美的技艺为世间留下璀璨的艺术品,但技术的发展也令延续传统面临新的挑战。安东尼奥的孙子卢卡曾在米兰学习工业设计,3年前带回3D打印机时,差点被祖父赶出作坊。“他说机器造不出‘玻璃的呼吸’”,卢卡笑着指向工作台,“现在我们用3D建模设计器型,再用传统吹制完成最后一道工序。”

傍晚的穆拉诺码头,满载玻璃制品的货轮正缓缓驶离。卢卡站在岸边,看夕阳为水面镀上金边,宛如流动的液态玻璃。“祖父告诉我,穆拉诺的秘密不在配方里,而在火焰与匠人的对话中。”他指向远处的集装箱船,“那些玻璃要去中国、美国、非洲,但它们永远扎根在岛上的火焰里。”

夜幕降临时,各家作坊的火光次第亮起,如泻湖上的星群。“火焰之花”作坊中,卢卡正用平板电脑记录当天的工艺参数,安东尼奥则在一旁修改传统配方。两种笔迹交错,像极了穆拉诺玻璃中缠绕的双色条纹。

这令我想起塞纳河畔的旧书摊,想起巴米扬山谷的文化坚守。古老与现代,从来都是文明长河中相互映照的波光。人类文明的珍贵之处,正在于这些跨越时空的传承与创新。如同穆拉诺的玻璃,既需要火焰的淬炼,也需要接纳光的折射,才能在岁月中绽放斑斓色彩。

下图:穆拉诺的工匠正在烧制玻璃器皿。 雅各布·马恩茨摄(影像中国)



## 跨越时空的回想

陈 曦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中瑞建交75周年。中国国家话剧院复排瑞士剧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于1962年创作的话剧《物理学家》,既是对经典的致敬,也是以当代视角重新演绎反战主题。

从形式而言,复排版《物理学家》沿用了原作的两幕剧结构与三一律框架,将20年时空压缩进封闭场景的2小时。故事发生在一家疗养院,3名年轻护士相继被害,警方将嫌疑锁定在3名“精神病患者”、物理学家“牛顿”“爱因斯坦”“莫比乌斯”之间。通过一系列精巧构思,全剧从嬉闹滑稽的第一幕凶杀案侦破,自然过渡到第二幕令人震撼的真相:物理学家们实际伪装疯癫。“莫比乌斯”发明了可以改变人类的技术,科学家的良知让他深知这种技术一旦泛滥,就会被野心家利用引发更大灾难,于是装疯;“牛顿”和“爱因斯坦”想要获取这项技术,也选择在疯人院装疯。但“莫比乌斯”以为焚毁的手稿,最终落入真正疯狂的院长“博士小姐”手中,他的牺牲最后毫无价值。当喜剧情节骤然剥落,悖谬与荒诞扑面而来,观众在欢笑之余陷入沉思。

发生的当下,物理学家们面临的困境并未曾过时,反而具有了紧迫性。在笑声中,作品主题的严肃性更显突出。

《物理学家》的舞美设计以峻峭克制的视觉语言和灵活多变的空间调度为特点,为演员提供了表演支撑,同步展现角色的心理裂变与情节的荒诞递进。走进剧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舞台中央的巨型三叶扇装置,让人联想到代表核辐射的警示符号,紧张感和压迫感油然而生。“莫比乌斯”在妻子离开后,蜷缩在快速旋转的三叶扇投下的巨大阴影里。此时,扇叶仿佛在碾压着他仅存的人间温情,将原作追求的“令人不安而非安慰”的戏剧内涵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

近年来,科学与伦理的关系愈发引发人关注。复排版《物理学家》彰显了创作者以艺术视角关注社会、洞察现实的责任感。正如“莫比乌斯”高呼:“公式是中性的。就像一把刀,厨师用它切面包,凶手用它杀人。”于今复排这部作品,不仅是为了反思战争,也警示人们:科技是把双刃剑,不要滥用,要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迪伦马特善于以喜剧形式呈现悲剧命运。在这轮演出中,创作者对这一风格进行了反差感十足的当代转译。他们压缩了原作中的沉重表达,模糊了过于具体的时代符号,代之以更具现代剧场张力的黑色幽默和轻快搞笑,比如,“牛顿”“爱因斯坦”的标志性道具苹果和小提琴突变为手枪,以及“博士小姐”的电动轮椅和警长的手机等道具。其用意不言而喻:在科技迅速发展、伦理挑战时有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研究员)

